

学术专论

《满洲实录》成书考^{*}

杨勇军

摘要 《满洲实录》是记载满族先世源流及清太祖努尔哈赤事迹的官书。本文考证了《满洲实录》的前身《太祖实录战图》的来历以及与太祖实录的关系,澄清了《太祖实录战图》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还考证了《满洲实录》成书的时间,并从文献记载和历史事实两方面,指出《满洲实录》83幅插图当中,前6图是乾隆时期所补绘。另外,本文还论证了《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在以上考据的基础上,本文首次在史学界揭发《满洲实录》是一部清高宗亲自参与作伪的伪书,并分析了清朝统治者作伪的动机。最后,鉴于《满洲实录》是一部伪书,本文还重新评定了《满洲实录》史料价值。

关键词 《满洲实录》 《太祖实录战图》 努尔哈赤实录 清实录 清高宗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2)-02-0099-13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Manzhou Shilu*

The *Manzhou Shilu* (Chronological Records of Manchu) is an official book that records the origin of the Manchu ancestors and Nurhaci's deed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precursor of the *Manzhou Shilu*—the *Taizu Shilu Zhantu*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izu Shilu*. It clarifies that the *Taizu Shilu Zhantu* is not *Manzhou Shilu*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first six of the eighty-three pictures were drawn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Furthermore, the eight volumes of the *Shilu* mentioned in a poem composed by Emperor Qianlong actually referred to the *Taizu Shilu Zhantu*, not to *Manzhou Shilu* as the previous scholars argued. Given the above evide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anzhou Shilu* is a forged book and that Emperor Qianlong himself took a role in the forgery process.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of the forgery and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Manzhou Shilu*.

一、《满洲实录》的现存版本

《满洲实录》是记载满族先世源流及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1626)事迹的官书。流传至今的努尔哈赤实录比较特殊,不仅有一部《太祖武皇帝实录》,一部《太祖高皇帝实录》,而且还有一部《满洲实录》,同一皇帝而有三种实录,这在流传下来的历朝实录当中是绝无仅有的。更为特殊的是,《满洲实录》

竟然有插图,也与历朝官修实录体例不符。

中华书局《清实录》影印说明中说:“《满洲实录》共有四部。这部书每页分成三栏,用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并有图。第一部绘写本成书于天聪九年(1635),第二、三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第四部绘写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部实录分别收藏在乾清宫、上书房、盛京、避暑山庄。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有上书房本,今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①中华书局以“上书房本”为底

收稿日期 2011-12-25

作者简介 杨勇军(1972—),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生;上海200241

本影印的《满洲实录》共八卷，每页分上、中、下三栏，上为满文，中为汉文，下为蒙文。汉文每页八行，行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不等，从左至右书写，与传统中文书写方式相反。全书共有插图83幅，每幅图占据一页、二页、三页、四页不等。全书共计单页图9幅，双页图70幅，三页图1幅，四页图3幅，共164页有图。每幅图左侧有图题，亦分别用满、汉、蒙文书写。

另据学者程大鲲文章，可知辽宁省档案馆藏有《满洲实录》两部。一部是满、汉、蒙三体文字合璧写本并附有插图，另一部是满、汉两体文字合璧写本，无插图。这两部书原藏于盛京故宫（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崇谟阁，曾在1905年被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现并予以介绍。1930年辽宁通志馆影印出版了插图本，之后这个本子就不知所踪，现在重新又被学者发现。插图本《满洲实录》“正文同样分为三栏，内容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叙述，遇有努尔哈赤、皇太极及被其追尊为肇、兴、景、显四祖皇帝之名时空白并加贴黄签，以示避讳。正文每页八行，版口为白口单鱼尾。每段正文前附有丰富且精美插图，插图有满、汉、蒙三种文字的图名。全书共有插图83幅，其中第一册有插图13幅，第二册有17幅，第三册有14幅，第四册有5幅，第五册有13幅，第六册有10幅，第七册有8幅，第八册有3幅”^②，将以上描述的情况与中华书局影印本对照，二者的版本特征完全一致。《满洲实录》书后有清高宗（1711—1799）《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诗注有云“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③因此有充足理由断定，两书同出一源，一为“上书房本”，一为“盛京本”，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二者并存于世间。

清代制度，每部实录告成后，例须缮写五份，分藏大内、皇史宬、内阁和盛京四处，依装潢及开本大小，分为大红绫本两部、小红绫本两部、小黄绫本一部。每部实录分别用满、汉、蒙三种文字缮写，藏盛京者则只缮满文、

汉文，不缮蒙文。《满洲实录》有所不同，现存的两部有插图本均为黄绫本，红绫本则未见著录。此外，《满洲实录》是满、汉、蒙三文合璧本，也不同于其他实录是三种文字单行本。辽宁档案馆藏另外一部无插图本《满洲实录》只有满、汉二文，似乎遵循藏盛京者只缮满文、汉文的惯例，但是这一部也以黄绫为封面。因此在度藏制度上，《满洲实录》也很有特殊之处。

二、《满洲实录》插图的来历

插图虽然有悠久历史，但是向来被汉人士大夫认为俚俗不经，不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修实录中了。《满洲实录》之所以有插图，与满洲统治者的爱好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载，^④努尔哈赤精通女真、蒙古、汉等民族语言，很喜欢读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明末的章回小说一般都有木刻版画，艺术水准很高，正如郑振铎所说“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人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⑤比如《三国志》有万历二十年（1592）建安版《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⑥内有狭长型的上图下文；还有金陵版《全像三国演义》，“其特点是双版大幅的插图，人物大型，图的两旁有内容提要的联语”^⑦；《水浒传》则有万历间苏派木刻画家所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共有二百幅插图。^⑧这些插图特别是那些描绘战争场面的插图，对于一个经常打仗的民族来说，更是印象深刻。此外，满洲其他贵族未必和努尔哈赤一样精通汉文，他们熟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方式只能通过他人讲述和观看插图，因此，插图在满洲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要用图像来描绘、歌颂乃至纪念先祖的战绩了。

《满洲实录》的插图虽为手绘，没有刻板，但是这些图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跟小说的木刻版画有很多相似之处，受明末木刻版画的

影响很大。五代以来的早期小说版画刊刻形式最为常见的是上图下文，宋元时期运用较为普遍，明代建阳书坊尤其偏爱上图下文，如上文提到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这种刊刻形式在建本小说中随处可见。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小说插图的刊刻形式呈现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单面整幅插图或双面相连样式的插图，如金陵世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以及上文提到的金陵版《全像三国演义》等。而《满洲实录》的插图正是采用了这一时期流行的单面大幅、双面大幅相连的绘图形式，甚至还出现三面、四面大幅相连的形式。这些大幅相连的图画采用全景式的构图，在二至四个幅面上充分表现出战役的规模与全貌。《满洲实录》的83幅图中，数量最多的是双面大幅相连图，共70幅；其次是单面大幅图，共9幅；再其次是四面大幅图，共3幅；最少的是三面大幅图，仅1幅。

这些图绘于天聪朝，《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天聪九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⑨由于太祖之称是崇德年间才有，因此图册最初的名称必不是“太祖实录战图”。根据《旧满洲档》的《天聪九年档》八月八日条满文的翻译，绘图一事是这样记述的“当天，淑勒汗委任张俭、张应魁二画匠，按照记述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描绘成图画的工作出色完成了，奖赏张俭一对人，牛一头。赏张应魁一对人。”^⑩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太祖”最早的称谓是“先祖英明汗”，而且图画的绘制也和“实录”无关，是为“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所绘制的。“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的满文罗马音译为 nenehe genggiyen han i yabuha kooli bithe，“太祖实录战图”的满文罗马音译为 taidzu huwangdi i yargiyan kooli afara nirugan，日本学者松村润认为，“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应是指额尔德尼和库尔缠编纂的满文本太祖纪”。^⑪

张俭、张应魁是两位汉人画工，生平史无详载。从仅有二画工得到赏赐上看，可知被后世所称的《太祖实录战图》，当时确实仅为图

册，没有文字。从二人所获赏赐厚薄上看，张俭或是地位较高，或是年龄较长，或是对图册的贡献较大。郑振铎在谈到明末画工时说，“他们的工作，是家庭的手工业。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子以是传之孙，世代相继，专务此业”。^⑫张俭和张应魁有可能是亲属关系。此外，《太宗文皇帝实录》又记载，《太祖武皇帝实录》书成，清太宗命令礼部官设宴于内国史院，宴修纂各官，内有“梁正大、张应奎各受银三十两”，^⑬学者认为此张应奎即为张应魁，“奎、魁之别，盖由满文转译汉字时只记音写造成，此类例证，清代多有，无足怪”，^⑭在《旧满洲档》中，张应魁与张应奎的满文罗马音译均为 jang ing kui，^⑮可见确为一人。但是，张应魁天聪九年已受赏，此时为何再受赏？与他曾一同受赏的张俭此时身在何处？《太祖武皇帝实录》并无配图，要画工又有何用？梁正大为何人，为何与张应奎同受赏？三十两银的赏额列倒数二等，只高于笔帖式的二十两，如为画图，不至于赏额如此之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因此，即使张应奎即为张应魁，还是有不少疑问待解决。

图册出现后大约一年又三个月，就诞生了文字的实录，可见文字工作早已开始。从逻辑上讲，绘图的工作仿佛应该算做修实录的一部分。但是，从开始编纂直到后来实录修成进呈的文献记载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开始编纂的时间，根据学者考证，是始于天聪七年（1633）十月清太宗下谕“尔记载诸臣，将所载之书宜详加订正，若有舛讹之处即酌改之。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乎？”^⑯而编修的动议来自于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房秀才汉人杨方兴的上奏，奏书说“一、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

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①这段文字提到了纂修满、汉两文实录，重点是汉文实录的纂修，并没有提到插图的事情。实录历经三年修成，修成后的实录除满、汉两文外，又增添了蒙文。《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崇德元年（1636）实录进呈之事：“（十一月）乙卯，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进呈。设大驾鹵簿。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各官，左右序立。上御崇政殿。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字，希福捧蒙古字，罗绣锦捧汉字，率修纂满洲、蒙古、汉人笔帖式等上表进呈。礼部官受表文，于御前跪读。表云：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率内院满洲、蒙古、汉人官员，稽首顿首，谨奏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臣等钦奉圣谕，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谨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书。……”^②从这段文字来看，场面不可谓不隆重，但是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前不久已经完成的图册。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三种文字的实录各自独立，而非三种文字同在一页的合璧版；二、图画不是为修实录而绘，而是独自成立的纪念努尔哈赤功绩的图册；三、即使这些图画是为修实录而绘，但是绘好后，并没有当做实录的“插图”，放置在满、汉、蒙三部实录的任何一部当中。由实录修纂的正规机构和人员配置来看，实录的修纂制度已臻完备，修纂人员恐怕早已明了实录作为官书，在体例上是不可以配图的。这部最早修纂的努尔哈赤实录，据《旧满洲档》，初名为《太祖太后实录》。顺治朝重修时更名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康熙年间重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完成，因太祖谥号由“武”变为“高”，故定名为《太祖高皇帝实录》。雍正十二年（1734）又重修，乾隆四年（1739）告成，成为定本。可见，在《满洲实录》出现之前，绘图一直独立存在，和努尔哈赤的文字实录没有关系。

三、《满洲实录》成书的时间

《太祖实录战图》成为《满洲实录》的插

图，是在乾隆时期《满洲实录》成书之时。据《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乙卯条载“大学士于敏中等奏：前奉谕旨，令主事门应兆恭绘开国实录。图内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并轮派懋勤殿行走翰林一人入直，照料收发报闻。”^③由此可知，《满洲实录》开始缮写于乾隆四十四年正月，而绘图则在此之前大概已经开始。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太祖实录战图》一分。八册，凡七十七图。乾隆四十六年，高宗纯皇帝敬览乾清宫所藏《太祖实录战图》，乃盛京旧本，特命依式重绘，一贮尚书房，一送盛京尊藏。”^④由此可知，《满洲实录》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另外，《满洲实录》书后有清高宗《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此诗为两本实录绘成之后所题，但是未题写作年代。此诗又收在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七十七，^⑤该卷卷首开篇之作为《辛丑（1781）元旦》诗，卷七十八开卷诗为《辛丑春帖子》，可知七十七卷所收诗均为乾隆四十六年初所作。由以上史料，可知两本《满洲实录》开始缮写于乾隆四十四年初，绘图开始的时间更早一些，全部完成则在乾隆四十六年初。《满洲实录》的成书时间远远落后于乾隆四年（1739）修成定本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以《满洲实录》是清朝所修最后一本努尔哈赤实录。

《盛京通志》亦载《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时间却标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⑥，与《御制诗四集》卷七十七收诗时间不同。并且，《盛京通志》本此诗诗注亦与《满洲实录》本、《御制诗四集》本小有不同，云“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已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兹复命敬绘此册，贮之避暑山庄，以便批阅，永凛守成。”增加了再绘避暑山庄本的内容。根据上文的考证，“上书房本”和“盛京本”均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初，而在此基础之上重绘第三本在时间上一定晚于前二者，因此“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的说法不可取。

况且,《清高宗实录》上确实有《满洲实录》在乾隆四十六年正月绘写完成两本之后又重鹄集原绘写人员再缮一本的记录,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辛巳条载“谕曰:开国实录,著八阿哥传原写清、汉、蒙古字各员,敬谨再缮一分,并著门应兆照旧绘图。”^{②3}避暑山庄本开始绘写于四十六年五月,何时竣事不详,此本今不见传,只有汉文抄本存世。

四、前六图和后七十七图

现存的两本《满洲实录》,都完整保存了83幅图。从内容上看,83图可以分为前6图和后77图两部分:前6图都是表现满洲起源的神话传说,与战争无关;后77图则是描绘攻城野战、结盟庆典等一系列开创满洲基业的赫赫战功。从形式上看,两部分都由一幅地图起始,前者是冠首的第1图“长白山”,描绘长白山及周围河流,后者是第8图“满洲发迹之处”,描绘赫图阿拉及周围山川形势,二图都交代了以后各图内容情节展开的背景,起到总领每部分的功用,各自成为一个独立体系。后一部分的77图中,第7图“都督□□□(孟特穆)计杀仇人”冠首,是由于第8图“满洲发迹之处”中心是后金开国第一都城赫图阿拉,而此城是清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奠基于此,故将此图冠于“满洲发迹之处”之前。

根据《高宗纯皇帝实录》,门应兆负责“恭绘开国实录”。而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得知“《太祖实录战图》一分。八册,凡七十七图。”^{②4}松村润等学者认为“七十七图”是“八十三图”之误,但是却不讲明致误原因。^{②5}其实,“七十七图”不仅不误,而且恰恰反映了《太祖实录战图》单独成书时的原始面貌。《满洲实录》与《太祖实录战图》相差的6幅图,正好就是《满洲实录》有而《太祖实录战图》无的关于满洲开国神话的6幅图。这6幅图包含了满洲起源三个重要的传说:长白山发祥(1、长白山)、三仙女的传说(2、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3、佛库伦成孕未得同升;4、佛库伦临升囑子)、布库里雍顺及其后代的传说(5、三姓奉雍顺为主;6、神鹊救樊

察)。

根据松村润的研究,“在《武皇帝实录》开头,有一段关于长白山的记载,这是按照《大元一统志》写成的。这段记载在满文本《武皇帝实录》中写在了第一页的正、背两面上,背面仅有一行就写完了,后面的八行全是空白,从这种情况来考虑,是否可以说关于长白山的这段记载是后来加在第二页‘满洲源流’之前,如此以清朝祖先的发祥地假定作为长白山。并且,由此女真族即使自古就以长白山为圣地,然而记过长白山为祖宗发祥地的传说以《太祖实录》为首,并且将此说固定下来则更是后来的事,即在康熙皇帝的上谕(《满洲源流考》卷十四)中可以见到这样的话‘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满文老档》及清初的任何资料中,都见不到这样的说法,应该说康熙皇帝在对长白山考察之后,长白山才被定为清祖发祥的圣地,并确定了圣地的位置”。^{②6}既然长白山作为发源地大约康熙时才载入史册,因此第1图“长白山”在天聪时绘的《太祖实录战图》中不可能有,只能是门应兆所补绘。

根据记载,第2图“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第3图“佛库伦成孕未得同升”、第4图“佛库伦临升囑子”关于天降三仙女和含朱果受孕的神话,是皇太极在天聪九年五月初六日才从来自黑龙江的一个降人穆克什克那里听到的。^{②7}而图册献呈的时间是天聪九年八月初八日,^{②8}如果这三图为张俭、张应魁所绘,则只能成于这三个月,还必须是皇太极一听到这个神话,就将其作为满洲发祥的故事不假思索全盘接受,然后立即命令画工绘图,加在《太祖实录战图》之前。其实这个假设很难立足,因为穆克什克所说的故事只是粗具轮廓,而满洲发祥的传说是将神话和历史融为一体、精思熟虑后的产物。很多学者认为三仙女的传说是在清统治者汉化已深之后比附殷之玄鸟生商受命于天的故事,^{②9}因此这三幅图成于张俭、张应魁之手的可能性非常小。

穆克什克的故事说到佛库伦生下库布里雍顺就没有了下文,而生下以后如何,有何奇才异能,和爱新觉罗氏有何关系,都未提及,而第5图“三姓奉雍顺为主”、第6图“神鹊救

樊察”表现的正是布库里雍顺及其后代的传说。松村润依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的资料,指出布库里雍顺及其后代的传说应是顺治时期缮修《武皇帝实录》时添加上的。因此第5图和第6图在天聪时绘的《太祖实录战图》中也不可能有,只能是门应兆所补绘。

由此可见,《满洲实录》的插图应该分成两部分,两部分的作者和绘成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前6图为门应兆所补绘,内容是满洲的开国神话传说;而后77图是门应兆以张俭、张应魁的《太祖实录战图》“依式重绘”,内容主要是太祖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并进攻明朝征战辽东的赫赫战功。努尔哈赤死后,谥号先为“武”,就是彰显他身前武功强盛,打下江山,奠定大清基业。天聪朝绘的《太祖实录战图》,有留作纪念之意,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原本,但是依赖门应兆重绘的《满洲实录》插图,多少可以一窥原貌。前6图为门应兆自出机杼,但是从艺术风格上已经难以看出与后77图相比有何差异。从常识上讲,门应兆补绘这6幅图,一定在绘画风格上向《太祖实录战图》进行了靠拢,而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时,也必定经过了自己的润色。

门应兆是清乾隆间供奉于内廷的著名画师,字吉占,汉军正黄旗人。工人物及花卉。由工部主事,派懋勤殿修书,充四库馆绘画分校官。补工部员外郎,升郎中,后出任宁国府知府。^②门应兆参与绘制过《皇朝礼器图式》,“每一件东西都描绘地极精、极确”,^③清朝的典章制度赖此书以传。另外,门应兆补绘名画家的作品也很有名,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清高宗还会命他补绘明末清初画家萧云从(1596—1673)的《离骚图》,所成《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因此,他是能够胜任给《满洲实录》绘图这一工作的。

清代统治者很重视用图像来描绘人物、事件和文物典制,如南巡、大阅、献俘、礼器、卤簿、职责等,都有图画遗留后世。又有专门机构收藏图画,南薰殿藏古帝后像,茶叶库保存历代功臣像,舆图房掌图版,藏图都很丰富。清高宗尤喜以图画来记录战功。乾隆年

间,二平准噶尔,一定回部,再扫金川,一靖台湾,降缅甸、安南各一,两次受廓尔喀之降,合为十全武功,都用图画进行过描绘。清高宗不仅用绘图来记录自己的战功,而且还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刷印图画。《国朝宫史续编》书籍门图刻之属,凡分二卷,首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次为《盛京事迹图》五卷,其余都是记录清高宗十全武功的各种“战图”。其中《御题平定伊犁回部全图》是清高宗命令内廷西洋画家郎世宁等人所绘,绘成后寄往法国雕版,“自乾隆三十年(1765)内务府造办处传办刊刻得胜图,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铜版镌刻竣工刷印图画运达北京,前后历时十年之久”。^④内廷西洋画家后来又奉命作《平定两金川图》、《平定台湾战图》、《平定廓尔喀战图》、《平定安南战图》,皆铜版刷印。他下令重绘《太祖实录战图》的意图也很明显,编纂《国朝宫史续编》的臣工就将他刷印十全武功图画和重绘《太祖实录战图》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洎我高宗纯皇帝敬观实录,载摹开国战图,以昭有赫而示无疆。嗣是绩阐十全,铭勒绘像,实为炳耀鸿业千古莫京之盛。”^⑤他重绘《太祖开国战图》,一方面是将他的开拓疆域之功与太祖努尔哈赤的建国伟业相比,显示他继承先祖鸿业,武功强盛;另一方面,也不无将他这一痴迷绘图纪功的嗜好合法化,披上“祖宗之法”外衣的目的。

五、《太祖实录战图》八册 和《满洲实录》八卷

清高宗《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⑥除此之外,诗注中提到“实录”之处还有三处。根据题目《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实录八册”究竟是指“《太祖实录战图》”还是“太祖实录”,颇容易引起歧义。如果是后者,并且还是“国家盛京时旧本”,则只有崇德元年纂修的《太祖太后实录》符

合条件。因此，后世学者对“实录八册”何所指称，历来有此两说。首先来看清朝官方是如何认定的。

《开国方略》卷首清高宗与臣工的联句诗注文中有“乾清宫敬贮《太宗实录战图》八册，乃盛京时旧本。皇上以尊藏之帙，子孙不能尽见，因于辛丑春，命依式重模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敬藏，并御制敬题诗什。”^⑤其中，《太宗实录战图》为《太祖实录战图》之误。这句话将《太祖实录战图》与“八册”并称，即认为《敬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中的“实录八册”就是《太祖实录战图》。《开国方略》成书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与《满洲实录》绘成相距五年。臣工的这种指称公然出现在《开国方略》联句诗中，清高宗未见有异议，抄入《四库全书》亦未见有修改。又据《国朝宫史续编》：“《太祖实录战图》一分。八册，凡七十七图。”^⑥以上记述也是将《太祖实录战图》与“八册”并称。两段记述内容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臣工一致认为清高宗所言“实录八册”即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并无产生歧义。

这个意见被后世一部分学者所接受。但是学者在接受的过程中，却做了错误的推论：第一，认为《太祖实录战图》原先有文字；第二，《太祖实录战图》八册即为《满洲实录》八卷的原本。1905年内藤湖南发现盛京崇谟阁藏本《满洲实录》后介绍给学界，他将《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的记载“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⑦首次与《满洲实录》末尾《敬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中“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联系起来，认为《满洲实录》的原本为《太祖实录战图》。^⑧孟森也接受这个说法，他认为“清太祖第一次初纂实录，在太宗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既成，而又摘图中之说，别为一本。”^⑨“每图带说”的误解根深蒂固，到了八十年代，学者单士元承其师说，更是直接认为《太祖实录战图》即为《满洲实录》：“清朝在未统一全国还在东北地区称‘汗’时期，也修过实录。这就是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

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⑩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时，亦认为该书“第一部绘写本成书于天聪九年（1635）”，^⑪并将其编排在《太祖高皇帝实录》之前。

《满洲实录》八卷，各卷之前都用“卷一”、“卷二”、“卷三”等满、汉、蒙三种文字标明，并非八册。从文献学角度来看，不仅“卷”、“册”有别，而且书本“卷”、“册”和图画“卷”、“册”的涵义也不相同。“唐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书画装裱和书籍装帧方才逐渐分为两种工艺。古代书籍的名称中如‘册’、‘卷’，在今天仍然沿用，而‘轴’、‘卷轴’、‘册页’等名称，便成为书画装裱款式的专用语了。”^⑫对于书本来说，“有以一卷为一册者，有以数卷为一册者，必视其书之厚薄为之。”^⑬由于卷数固定，而册数随意，故一般称书以卷而不以册。而《太祖实录战图》称“册”不称“卷”，正好说明《太祖实录战图》是图画而非书本，因为“中国书画的装裱，是根据书画幅面的不同规格和款式，分别采用不同的装裱款式，而册页，正是传统的装裱款式之一”^⑭。

著录有《太祖实录战图》的《国朝宫史续编》将图画分为图像、图刻、图绘三类，每图记录形制和尺寸，有轴、幅、卷、册、分、函的不同称谓。“轴”即传统书画装裱款式中的立轴，一般长度大于宽度，如“《孝陵图》一轴：纸本，纵一丈零五寸，横三尺七寸。”^⑮“幅”即横披，一般宽度大于长度，如“《泰陵图》一幅：纸本，纵七尺四寸，横八尺四寸。”^⑯《国朝宫史续编》中，斗方、圆盘、扇面等款式也称“幅”。“卷”即手卷，一般幅面特宽，如“《皇舆全图》十卷：纸本方格，纵一尺七寸，横一丈六尺。”^⑰“册”即册页，主要用于装裱小件字画，每一册少则几页，多则七、八十页，如“《江扬舆图》一册：绢本，纵一尺九寸二分，横一尺七寸，凡二十一叶。”^⑱同一系列的若干册页或是若干幅图加上函囊，就叫做函，没有函囊，就叫做分，如“《御题平定伊犁回部全图》一分：铜版纸印本，每幅纵一尺六寸，横二尺七寸，

凡三十四幅。”^④《太祖实录战图》就是没有函囊的一分册页，共八册，77图，157页，平均每册近20页。

日本学者松村润在努尔哈赤实录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代表了该领域的最高水平，他也意识到《太祖实录战图》只是图画没有文字，于是另辟蹊径，无视清代官方“《太祖实录战图》八册”的说法，而对“实录八册”作了另外的解释。他认为“《满洲实录》是在乾隆年间根据乾清宫藏盛京旧本即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实录》重绘写的。但不是照样绘写崇德初纂本的内容，其内容几乎完全依据了顺治重修本内容。很明显地沿袭了顺治重修本改写过开国纪的记载。还有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的汉字标记比乾隆重修《高皇帝实录》更新，与乾隆五十一年（1786）完成的《开国方略》一致。在满文缀字法上同样与在乾隆年间重抄《旧满洲档》的《满文老档》的缀字法一致。只有在卷数上依据了崇德初纂的满文本的八卷八册的样式。”^⑤崇德初纂的满、汉、蒙文本《太祖太后实录》均已失传，内容与卷数不详，乾隆年间是否存在也缺乏记载，松村润对《满洲实录》和《太祖太后实录》关系的假定殊乏证据支持。另外根据学者陈捷先逐字逐句对照，《满洲实录》的满文部分几乎是完全照抄满文《武皇帝实录》，^⑥只不过满文《武皇帝实录》只有四卷，不符合清高宗诗注“实录八册”之说，故松村润只好将《满洲实录》与已经失传的满文本《太祖太后实录》硬扯上关系，并且由“实录八册”之说倒推得出满文本《太祖太后实录》为“八卷八册”的结论，殊不能令人信服。他显然是不明图画和书本的“卷”、“册”有别，图画“八册”不能对等于书本“八卷”，将“实录八册”解释为崇德初纂的满文本《太祖太后实录》，煞费一番苦心，可惜还是解释错了。

六、《满洲实录》是一部伪书

《满洲实录》是乾隆时期官修的最后一部以图画为中心记载满洲起源神话和努尔哈赤开国功绩的实录，可是后世很多学者诸如内藤湖

南、孟森、单士元等人却误会此书天聪朝即已出现，乾隆时期不过重绘重抄而已。他们的误解其实是与清统治者的故意误导分不开的。清朝官方对该书成书过程的百般遮掩、蒙蔽事实，以制造此书早已有之的种种做法都是有意为之。也就是说，《满洲实录》是一部存心作伪的伪书，作伪之迹甚为明显：

第一、《满洲实录》有83幅插图，清高宗在诗注中说是“依式重绘”，但是根据上文的考证，实际的做法却是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还补绘了关于满洲起源神话的6幅图。清高宗和清朝官方对后补的这6幅图都不加任何说明，意在误导后人以为这些神话在天聪朝绘制《太祖实录战图》时已经存在。

第二、《满洲实录》本无其书，是在一本图册的基础之上不仅补绘了图，还补充了文字，乾隆四十六年才修纂而成，但修纂的过程只用“恭缮”二字瞒天过海，给人造成此书早已存在的假象。《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图内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⑦清代在内阁中设中书，官阶为从七品，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前名单可知，纂修《太祖高皇帝实录》用了21名中书，分为办事中书和撰文中书两种，掌管收掌、翻译、誊录之事。清修实录在卷前一般都有纂修实录的官员名单，《满洲实录》用了12名中书，不可谓少，但是12名缮写官的名字在书中却无从得见。《满洲实录》的文字本来是无中生有，为何却叫做“恭缮”？一方面，道出了《满洲实录》成书的实情：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即可；另一方面，让人以为《满洲实录》原来实有其书，现在不过是誊录而已。

第三、《满洲实录》成书之前已经有乾隆四年修成定本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可是根据学者陈捷先考证，满文部分几乎是照抄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他将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之残三卷（全帙为四卷）之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满文部分一一勘校，“结果发现两书的内容相同，仅有文字上的小差异，几乎可以说两书是同一著作。”^⑧《满洲实录》汉文部分则以《太祖武皇帝实

录》的汉文内容为基础而变化。陈捷先指出，“显然在乾隆四十多年绘制这部书的时候，皇帝与参与工作的官员们，都没有受到《太祖高皇帝实录》一书的影响。”^{⑤4}这恰恰说明了该书存心伪造之迹，宁可不采用乾隆四年修成定本的《高皇帝实录》，偏要舍近求远，以《太祖武皇帝实录》为本，就是因为后者史料上更接近原始，语言上更为质朴，这样伪造出的《满洲实录》才更像一本早已存在的书。

为了使这部书弄假成真，还特意保留了一些原始记载和文字表述。如保留了太祖杀戮大臣噶盖扎尔固齐的经过，保留了太祖以四个婢女殉葬太宗生母的故事，而这些事情在定本《高皇帝实录》中都不同程度做了删略。在藻润文字上，据陈捷先研究，《满洲实录》中对明朝仍用敬词；对清太祖努尔哈赤仍用早年的书法；记时也用旧法，记日多不用干支，也不像《高皇帝实录》一样在每月之前增补朔日干支。^{⑤5}这些故意与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立异之处，亦是刻意为之，以显示此书自有渊源。

在体例上，《满洲实录》的插图是所谓“依式重绘”，文字是所谓“派员缮写”，但是却看不到任何人员的名单。与《武皇帝实录》一样，《满洲实录》无皇帝序文、无进呈表文、无凡例、无目录、无纂修人员名单，这些体例陋略之处，也是为了故意造成《满洲实录》成书在入关之前未受汉人修实录成例所影响的假象。总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体例上，清代官方将这本最晚修的太祖实录置于清朝所有实录之前的意图至为明显。

第四、《满洲实录》依据乾清宫的盛京旧本《太祖实录战图》绘写成书，分为八卷，每卷的图画大概也进行了重新编排。清高宗看到的重绘本，已经配上了文字，故他在《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里说“实录内载”云云。可是，清高宗在《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里，却有意将盛京旧本和重绘本混为一谈，他一面说“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一面又说“《实录》内首载长白山”，让人误会“盛京时旧本”《太祖实录战图》已经有了文字。为了达到混淆二者的目的，他在诗注中只称“实录”，而不

言明是旧本还是重绘本，误导后人以为《太祖实录战图》旧本就已经有了文字，从而认为《满洲实录》八卷即为盛京旧本八册。他的目的显然已经达到了，很多学者误会《满洲实录》即为《太祖实录战图》就是被清高宗的诗注所蛊惑。清高宗出于皇帝之尊，不敢公然作伪，但是他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言实录而不言是何实录，言册数而不言卷数，在作伪手法上也比常人技高一筹。清高宗其实是此书最大的作伪者，《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就是他作伪的证据。

《清实录》存在大量讳饰和篡改之处，孟森称其“长在推敲之中，欲改即改，并不似前朝修实录之尊重，亦毫无存留信史之意”，^{⑤6}“务使祖宗所为不可法之事，一一讳饰净尽，不留痕迹于实录中，而改实录一事，遂为清世日用饮食之恒事，此为亘古所未闻者。”^{⑤7}如今，《清实录》屡经修治、尽删所讳、湮灭真相的事实已为人所共知，但是这些伎俩跟《满洲实录》彻头彻尾出于伪造比较起来，犹小焉者也。

七、《满洲实录》造假的原因

《满洲实录》卷一于“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之下注曰“南朝误名建州”，^{⑤8}意思说女真族的先祖早已建立了满洲国，明朝误为建州。这一桩有意讳饰的事件，史家早已揭破，目的在于掩饰他们与明朝的臣属关系。“长白山发祥”、“天降三仙女”等神话传说都在于阐明满洲是自天而降，与明朝毫无隶属关系，但是清朝官方能找到的最早的史料，只是八册有图无文的《太祖实录战图》。于是，他们依托《太祖实录战图》原有的77图为基础，新补入6图和文字，以与真迹相窜乱，制造了伪史《满洲实录》，来充当满洲起源的证据。所以，《满洲实录》是一本图画部分为伪、文字全伪的依托真迹来作伪的伪书。

满族由部落建成国家，占有东北和蒙古大片土地，进而入主中原，勃兴时间之短，让人惊叹不已。明末人写了很多满族发展历史的著作，如“女直考”、“建州考”、“东夷考”等。这些人对满族所做的种种解释，虽然有些

是耳听途说，有些带有民族歧视，但是多少涉及了一些历史真相，清高宗对此甚为不满，称“明季狂诞之徒，寻摘字句，肆为诋毁，此如桀犬之吠，无庸深较，而舛误之甚者，则不可以不辨”^③。为了掩盖历史真相，清统治者采用了种种手段，如诛杀私人编史者，康熙间的文字大狱庄氏史案，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庄氏所修明史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为统治者所忌讳。在禁毁私家修史的同时，乾隆年间，清高宗又至少采取了两种手段来为满族历史“正本清源”：一为官修《满洲源流考》和《开国方略》，一为伪造《满洲实录》。

《满洲源流考》、《开国方略》是两部与《满洲实录》互为表里的书。《满洲源流考》二十卷，清高宗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下令编修，总裁即为编纂《满洲实录》的大学士于敏中。《满洲源流考》“如建州之沿革、满洲之始基，与夫古今地名同异，并当详加稽考，勒为一书，垂示天下万世”。^④《满洲源流考》刚编完，就开始了《满洲实录》的绘写。而《开国方略》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撰修，五十一年（1786）成书，是一本纂修时间早于《满洲源流考》，成书晚于《满洲实录》的著作。《开国方略》太祖努尔哈赤部分也是八卷，太宗皇太极部分为二十四卷，共三十二卷。清高宗敕命撰修该书，是要“直书”清朝开国创业的艰辛经过，《开国方略》序云“兹《开国方略》之著，不重于继明定中原，而重于自俄朵里以至赫图阿拉，因十三甲筭路蓝缕，得盛京而定王业。若夫兴王之始，长白朱果，盖犹简狄元鸟，姜嫄履迹。天生圣人治四海，必有祥符与众不同，而更在于圣人之奋智勇，受艰辛，有以冠人世，答天命，夫岂异哉！”^⑤此书修成后任坊间刻印，可是由于书出官手，虚饰、隐讳、曲笔、篡改之处颇多，史学研究者普遍认为价值不高，很少引用。倒是《满洲实录》这本书，由于清统治者刻意作伪，棋高一着，反而瞒过了无数学者的法眼。

清高宗伪造此书乃天聪朝物还有一个不得已的苦衷。历代官修实录之例，都是后一朝修前一朝，而乾隆朝生出此书，与惯例不合，因此也只好说天聪朝即有之。清高宗《太祖

高皇帝实录序》云“太宗文皇帝继天登阼，命儒臣敬辑实录，规模略备。圣祖仁皇帝复加搜考，修纂成书，尊藏内府，并贮史宬。惟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名氏前后间有异同，清、汉之文或简或繁，未经画一，我皇考世宗宪皇帝惧有舛讹，特开史馆，重加校订，按日进呈，亲为阅定。朕缵承丕绪，仰体前徽，用复洁诚，披览卷帙如旧，缮录一新。”^⑥在这段序文里，谈到努尔哈赤实录的纂修，皇太极“敬辑实录，规模略备”，康熙帝“复加搜考，修纂成书”，雍正皇帝“特开史馆，重加校订”，清高宗虽然对《太祖高皇帝实录》大加修订成为定本，可能出力最多，却只能说“披览卷帙如旧，缮录一新”。况且乾隆四年清高宗已经钦定了《太祖高皇帝实录》，如果再钦定一本太祖实录，将置定本于何处？如果钦定《满洲实录》，不仅出现了两种太祖实录，而且也破坏了本朝不能修先祖实录的规矩，再加上《满洲实录》的插图也与历代帝王官修实录体例不合，因此只好说此书早已有之。《满洲实录》修成之后，在定名上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以至于乾隆四十六年清高宗题诗时，书名还没有定下来，只好以“实录”称之。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清高宗重又鸠集人员绘写第三本《满洲实录》，“谕曰：开国实录，著八阿哥传原写清、汉、蒙古字各员，敬谨再缮一分，并著门应兆照旧绘图”，^⑦称为“开国实录”，可见名字仍然未定。最终不知何时才采用了“满洲实录”的名称，却又不见任何记载，则《满洲实录》之得名，更使该书的成书过程笼罩在迷雾当中。

八、《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

由于误认为《满洲实录》的文字来源于最早的《太祖实录战图》，学者就不免夸大了《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郑天挺将《满洲实录》和《满文老档》的史料价值并列，称它们都是“满洲初期的资料”，“没有经过企图符合后来发展的润色”^⑧。学者孙文良更认为皇太极“统治时期编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是清朝的建国史，也是成文的满族勃兴史”^⑨。陈捷先对《满洲实录》

深研有得，他对此书的奇特之处颇感诧异：“《满洲实录》既成书于乾隆四十多年间，当时正是文字狱案大兴，搜求遗书不遗余力的时候，照理说这部书应该要符合当时时代要求才对，文字与内容方面至少也得像乾隆四年修订的高皇帝实录一样，强调满清的正统，删略不合帝王体式的记述。可是，出人意料的，《满洲实录》中不但行文简朴，汉化不深，而且若干俚俗淫乱的记载仍存留书中，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⑥对此，他认为原因是：“乾隆间的整理与重制旧满洲档及满洲实录，这完全是这位‘稽古右文’君主的热心与好大喜功的结果，因此他不删略档中和书中的丑恶记录，也未见他增饰更多的虚美之词。对于清太祖实录的修改来说，如果以‘改实录为日用饮食之恒事’来批评清高宗，我倒认为是商榷余地的。”^⑦如果清高宗具有“稽古右文”的热心，那么这一热心同样应该表现在他校订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上，可是事实上这三朝实录的篡改在整个清实录当中情况最为严重，已为识者所共鉴。对于三朝实录是如此，为何独于《满洲实录》网开一面？陈捷先此论，又给清高宗加上了不恰当的光环。只有确定了《满洲实录》是一本伪书，那么才可以重新审视其史料来源和价值。可以肯定的是，《满洲实录》本身绝对不是原始史料，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各种原档相比，实为第二手材料，史料价值不高。

《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⑧一部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⑨两部书均只有三卷，缺第一卷。陈捷先曾将这三卷文字“逐一地和《满洲实录》相核对，结果发现两书的内容相同，仅有文字上的小差异，几乎可以说两书是同一著作。”^⑩对于一些史实的记载，“《满洲实录》的内容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都是完全一样，只有少数几个字略有差别，对整个史事的内容根本无一关碍”。^⑪通过《满洲实录》满文本可以略窥《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散佚部分之原貌。另外，《满洲实录》还改正了《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的手民之误以及一些老旧字词的用法和写法。

《满洲实录》的汉文部分则以《武皇帝实

录》汉文本内容为基础而变化。在人名、地名的修饰上，不仅要比《武皇帝实录》雅化，也比乾隆四年定修本《高皇帝实录》为雅。全书为避帝讳，“弦”字缺末笔，^⑫“玄”字改写为“元”，^⑬“曆”字改写为“歷”，^⑭等等。因清统治者声称现存《满洲实录》是重新绘写，诸如人名、地名、讳字此类“文字上的小差异”，并不对该书所伪托的时代造成影响，故听任缮写官修改。另外，由于《满洲实录》虽为满、汉、蒙三文合璧，但是以满文为尊，因此汉文不仅要迁就满文的书写习惯从左至右，而且为了照顾满文的篇幅长度还得适当伸缩。从行间字数来看，满文的书写从容不迫，汉文则三字一行、四字一行、五字一行、六字一行不断变换以迁就满文。孟森也说“（《满洲实录》）于其所附之说，则以意改从后起之意，然说为图之篇幅所限，不能任意更动，只可扣准字数略加增损，故虽有改动，又不似定本之称意变置。其所改字句，乃与初纂、再纂本皆不同，亦与定本迥别。”^⑮故《满洲实录》中有与《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个别说法不同的地方，有些只是由于三体文字并行而造成汉文长短不得不伸缩以迁就满文而造成的。

因为现存《武皇帝实录》无蒙文本，所以《满洲实录》的蒙文部分来源不详，或许只是译自该书的满文本，并在翻译时参考了汉文本。根据学者乌兰其木格的比较研究，“发现其蒙文部分内容基本上与其满文内容相同，可见《满洲实录》的蒙文部分内容也不是天聪九年产生的，而是乾隆时期，增纂《太祖实录图》时才产生的。”^⑯但她同时认为“其蒙文部分内容基本上与其满文内容相同，但仍有一些记载不同于满文本，而相同于汉文内容，并且有的蒙文内容和记载方法与汉文和满文内容哪一个都不相同。”^⑰关于蒙文记载与汉文、满文记载均不相同之处，她举了三个地名为例：（1）汉文“赫图阿拉”、满文“赫图阿拉”、蒙文“山间高台地”；（2）汉文“邻朝鲜境”、满文“沿着朝鲜境”、蒙文“朝鲜境外”；（3）汉文“至于人居之处”、满文“至运水之渡口”、蒙文“至取水之渡口”。她还举了一个器物名不同的例子：汉文“坐具，

似为椅形”、满文“杌子”、蒙文“桌子”。从以上所举例子可以看出，蒙文内容与汉文、满文内容并无太大出入，不过是三种语言在字义上无法一一对应而产生的翻译问题。乌兰其木格又举出两个满文和蒙文有记载而汉文无记载的内容，比如卷一“布库里雍顺住白山太阳升起之方向的名为鄂莫晖之平地的鄂多理城”，这句话汉文付之阙如。^⑭其实这些遗漏之处正是上文提到的由于三体文字并行而汉文不得不扣准字数以迁就满文造成的。

《满洲实录》书名的由来，恐怕是整个成书过程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件事。乾隆时重绘《太祖实录战图》，由于配上了文字，所以不便再称为《太祖实录战图》。在《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中所称“实录”与《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所称“开国实录”，这两个名称都与太祖有关，全

称应该是“太祖实录”和“太祖开国实录”。之所以两个名称有所省略，是因为如果不加省略，称为“太祖实录”或“高皇帝实录”，则已有钦定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揆之情理不能出现第二部；称为“太祖开国实录”，则开国定号者据《满洲实录》所言实为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似乎也不妥当。这本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虽然图画和文字都是以努尔哈赤为中心，体例也是帝王实录体例，起讫年代也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并无二致，却不知何时又在何种情形下，没有冠上太祖的名称，而是冠上了“满洲”二字。按照清高宗的解释，“满洲”是其部族的名称，是国号。虽然目前不明这个得名的由来，但是将一个帝王的实录转而变为一个部族的历史，这种历史观的进步恐怕非乾隆时期的人所有。

* 本论文获得华东师范大学 2011 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基金资助，资助编号为 MXRZZ2011004。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华书局《影印说明》，《清实录》第 1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2 页。

② 程大鲲《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洲实录〉版本探析》，《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1 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③ 《满洲实录》卷 8，《清实录》第 1 册，第 423 页。

④ 黄道周《博物典汇》卷 20，《续修四库全书》第 124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721 页。

⑤⑥⑦⑧ 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 49 页；第 58 页；第 63 页；第 67 页。

⑨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 24，天聪九年八月乙酉，第 320 页。

⑩ 满文原文见《旧满洲档》第 9 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 年，第 4415 页；汉文翻译采用松村润译文，见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3 页。

⑪ 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 44 页。

⑫ 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第 97 页。

⑬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 32，崇德元年十一月乙卯，第 406 页。

⑭ 徐丹良《“努尔哈赤实录”考源》，《满学研究》第 1 辑，1992 年。

⑮ “张应魁”满文见《旧满洲档》第 9 册，第 4415 页；满文罗马音转写采用陈捷先译文，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 年，第 6 页。“张应奎”满文见《旧满洲档》第 10 册，第 5307 页；满文罗马音转写采用陈捷先译文，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 22 页。

⑯ 《清太宗实录》卷 16，天聪七年十月己巳，第 214 页。

⑰ 《杨方兴条陈时政奏（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 年，第 37—38 页。

⑱ 《清太宗实录》卷 32，崇德元年十一月乙卯，第 404—405 页。

⑲ 《清高宗实录》卷 1076，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乙卯，第 436 页。

⑳ 庆桂等编《国朝官史续编》卷 97，左步青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956 页。

㉑ 《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1308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550 页。

㉒ 《盛京通志》卷 15，《四库全书》影印本第 501 册，第 289 页。

㉓ 《清高宗实录》卷 1130，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辛巳，第 109 页。

㉔ 庆桂等编《国朝官史续编》下册，左步青校点，

第956页。

②⑤松村润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51页；又见徐丹俊：《“努尔哈赤实录”考源》，《满学研究》（第1辑），1992年。

②⑥⑧松村润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第49页；第43页

②⑦②⑧《汉译〈满文旧档〉》，李林译，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第57页；第105页。

②⑨程迅 《“三仙女”是女真族的古老神话吗》，《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

③⑩胡敬 《国朝院画录》卷下，《续修四库全书》1082册，第56页。

③⑪郑振铎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第180页。

③⑫庄吉发 《清代乾隆年间的铜版得胜图》，《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附录二，中华书局，1987年，第529页。

③⑬庆桂等编 《国朝宫史续编》卷96，左步青校点，第943页。

③⑭《满洲实录》卷8，《清实录》第1册，第423页。

③⑮《皇清开国方略》卷首，《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41册，第13页。

③⑯庆桂等编 《国朝宫史续编》下册，左步青校点，第956页。

③⑰《清太宗实录》卷24，天聪九年八月乙酉，第320页。

③⑱孟森 《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481页。

④①单士元 《整理清代实录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

④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华书局 《影印说明》，《清实录》第1册，第2页。

④③④④冯增木 《中国书画装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第136页。

④⑤叶德辉 《书林清话》卷1“书之称册”条，李庆西标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④⑥④⑦庆桂等编 《国朝宫史续编》卷99，左步青校

点，第990页；第990页；第989页。

④⑧庆桂等编 《国朝宫史续编》卷100，左步青校点，第1001页。

④⑨庆桂等编 《国朝宫史续编》卷97，左步青校点，第960页。

⑤⑩松村润 《清太祖实录研究》，敖拉翻译，《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3期。

⑤⑪⑤⑫⑤⑬⑤⑭⑤⑮⑤⑯⑤⑰⑤⑱陈捷先 《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第92页；第92页；第70页；第66—69页；第65、66页；第100页；第92页；第92页；第91页。

⑤⑲《清高宗实录》卷1076，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乙卯，第436页。

⑤⑳㉑孟森 《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688页；第686页。

⑤㉒《满洲实录》卷1，《清实录》第1册，第8页。

⑤㉓⑥④《清高宗上谕》，《钦定满洲源流考》卷首，《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99册，第452页；第453页。

⑥①《清高宗御制皇清开国序》，《皇清开国方略》卷首，《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41册，第2页。

⑥②《清高宗太祖高皇帝实录序》，《太祖高皇帝实录》首卷3，《清实录》第1册，第11页。

⑥③《清高宗实录》卷1130，乾隆四十六年五月辛巳，第109页。

⑥④郑天挺 《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洲族源》，《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⑥⑤孙文良 《〈满洲源流考〉辨析》，《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3期。

⑥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第02358号，2008年。

⑦②⑦③⑦④《满洲实录》卷1，《清实录》第1册，第51页；第72页；第24页。

⑦⑤孟森 《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82、483页。

⑦⑥⑦⑦⑦⑧乌兰其木格 《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第224页；第224—226页。